

戰爭遷徙到冷戰移動： 熱戰到冷戰的戰爭書寫、 女性離散與文化跨界¹

文 | 熊家瑜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周子謙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前言

女學會 2022 年度研討會「性別、空間與（不）移動」，其中「戰爭遷徙到冷戰移動：熱戰到冷戰的戰爭書寫、女性離散與文化跨界」圓桌論壇由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李淑君副教授主持，發表人主要聚焦於二戰與戰後的亞洲社會女性各自的生命經驗，既有文學的表白，也有歷史的縱深，更有社會學的觀察之眼，透過不同的女性在時代中的移動及其紀錄展現出不同風貌。

第一位發表人林瓊華（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試圖從謝雪紅移動大半輩子的生命歷程，以及其政治選擇，對比如今臺灣社會對謝雪紅的評價方式，提出關於歷史認知與詮釋的質問。第二位發表人王鈺婷（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從女性的書寫和文學的角度來看國共抗戰結束後，隨著國民黨來臺的女作家之生命經驗。第三位發表人張俐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則是從臺灣既有的抗戰文學作品和小說敘事中，爬梳其中的國共關係。最後一位發表人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以有

1 本文經本場次論文發表人檢閱修訂。

別於歷史和文學的社會學研究取徑，分享了臺灣女性在冷戰時期的工作、婚姻和地域之間流動的關係。

以下將先分別摘要四位發表人的研究，再由筆者挑選出「當代臺灣社會與如何回望歷史」、「冷戰與國共對峙下的臺灣與香港」與「女性勞動者的離散軌跡」三個主題進行綜合記錄。

發表人摘要

林瓊華以〈在流離時代不斷探求真理的臺灣女人：民主社會主義者謝雪紅返鄉了嗎？〉為題，論文以臺灣著名女性政治運動家謝雪紅（1901-1970）為討論對象，其核心論述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是謝雪紅的生命史，以及作為臺灣第一代民主社會主義者所遺留下的歷史痕跡；第二則是從謝雪紅逝世以後為觀察起點，討論謝雪紅形象的再現，如何隨著中一臺政治關係的波動，而形構成不同變化。

關於謝雪紅的生命經驗，林瓊華著重在三個時間點。1928年謝雪紅自莫斯科返回中國後，在日共協助下與

林木順提出〈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展現出民主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對臺灣民族與階級意識的關懷，這份政治文件既是日治時期臺灣殖民地首次出現推翻殖民體制的政治路線，也是臺灣史上第一次提出以社會主義建立獨立的臺灣共和國訴求。戰後，謝雪紅投身二二八的反抗運動，主張全面性的武裝抗爭路線。在「二七部隊」事件中，林瓊華援引作家李喬在小說《藍彩霞的春天》中的一句話：「反抗就是愛」，認為在臺灣連續殖民史中，二七部隊的反抗行動可謂是「為臺灣銘刻了『尊嚴的二二八』」，展現臺灣人為家園尋找出路的積極意志。二七部隊解散後，謝雪紅展開逃



亡之路，1947 年 11 月 21 日在香港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並草擬〈「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提倡設立民主聯合政府，採取地方與中央平權的均權主義，主張人民享有的選舉權，不受性別、種族、財產多寡與教育程度等條件限制，高山族²人民一律平等，並有組織自治單位的權利等。

接著，林瓊華把視線拉回當代臺灣社會，敏銳地指出 1927 年「臺灣文化協會」的路線分歧，事實上是以民主投票的方式，由連溫卿一派的左翼分子以懸殊的 11：2 通過文協改變組織路線的決議³。但在 2021 年文協 100 周年臺灣社會的相關報導與活動中，卻明顯可見文協的左翼歷史處於被忽略或遺忘的狀態。相同地，時至今日謝雪紅在臺灣社會中的形象，隨著臺灣與中國的關係的變化而改變，因為臺共曾與中共連結的事實，而抹煞了她本身對政治理想的堅持與不畏艱辛的努力。因此，林瓊華質疑「謝雪紅真的返鄉了嗎？」也提出「今日臺灣社會不需要對資本主義重新進行反省了嗎？」的問題，她認為謝雪紅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迄今仍值得臺



王鈺婷（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灣從「民主與平等並行」的角度作為創建國家內涵的反思。

王鈺婷接續發表〈離散與跨域：遷徙來台的女性敘事〉。首先闡述「離散」與「跨域」的意涵，引述李有成《離散》中指出離散經驗具有繁複且多樣的特性，因此特別關注個別作家生命經驗中的離散性，如何發展出具創造性的對話空間。而戰後遷臺女性作家的書寫，不止涉及離散問題，更是呈現出一種跨域性，因此在論述上所要詢問的是「為何跨域？」——當中的自主與不由自主，以及「何以跨域？」——個人資本、能力形塑出的「可跨越性」。

接續，王鈺婷以兩位五〇年代臺

2 為忠於歷史，此處沿用 1947 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中對原住民族之稱呼。

3 11 票的多數為左派委員，少數的右派兩票是林獻堂（1881-1956）和蔡培火（1889-1983）。

灣女性作家——徐鍾珮（1917-2006）與鍾梅音（1921-1984）為例，探討在國共分裂後遷移來臺的女作家，以何種論述位置展開跨域的離散書寫，其作品又如何從「懷鄉書寫」位移至「書寫臺灣」。王鈺婷指出，在徐鍾珮與鍾梅音的散文作品中，雖然也能看到逃難與懷鄉的情節，初期在臺灣社會的生活充斥著「浮萍之感」，但五〇年代的臺灣女性作家書寫，除了有符合文學史窠臼的反共與懷鄉，同時也存在著一批楊照論述中提及「既不反共，又不怎麼現代的伏流」。王鈺婷遂引用范銘如的論述，指出這群女性作家的書寫，特別之處在於以臺灣為文本背景，談及性別與省籍議

題，思考如何「重建家園」，並非一味依靠懷鄉式的憑弔。同時徐鍾珮與鍾梅音二人的社經地位差距，也導致二人在「書寫臺灣」主題上出現意識形態的不同。概括而言，在徐鍾珮與鍾梅音的例子中，可見離散問題除了關乎懷鄉意識，同時也使新移民在新地方重新找到「具創造性的對話空間」，以至於對「家園」有了重新想像的可能。

張俐璇則以〈江湖情事：臺灣「抗戰文學」裡的國共關係〉為題，探討戰後臺灣「抗戰文學」如何呈現國共關係的消長。她以「四大抗戰小說」為例⁴，指出戰後抗戰小說常見的敘事模式：以第一人稱長篇小說的方式，透過小說主角的親身見證與回憶，加上反派角色（多為共產黨員）的插入，形塑出「好 vs. 壞」的二元對立，除了襯托出主角在遭逢戰亂、政治局勢轉變下正向的心靈成長，更是收其反共之效。

接著，文章轉而爬梳「抗戰文學」在文學史論述的層面上，如何展現國共間微妙的角力關係。張俐璇指出，第二波對「抗戰時期文學」的熱



張俐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4 「四大抗戰小說」分別為潘人木《蓮漪表妹》（1952）、王藍《藍與黑》（1958）、徐鍾珮《餘音》（1961）及紀剛《滾滾遼河》（1970）。

烈討論出現於七〇年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隨著 1978 年改革開放，八〇年代逐漸出現對抗戰文學相關討論的重省與修正，在解放區文學研究之外，加入美國漢學家對淪陷區文學的研究。而臺灣一方，相對於五、六〇年代為「抗戰小說」生產的高峰期，八〇年代則是為了爭奪對「抗戰時期文學」的詮釋權，而出現了不少史料文獻的整理。

最後，張俐璇選取了上官鼎《雁城諜影》（2015 年出版）與王藍《藍與黑》（1958 年出版、2015 年再版）兩部抗戰小說，將討論焦點轉移至小說內部對國共關係的展現。尤其《雁城諜影》中不再「反共」，代之

是描寫國共合作抗戰的情節，末章更將場景移到香港，透過香港此一特殊空間，形塑出國共間曖昧不清的新關係。由此可見，臺灣抗戰文學中的國共關係，從小說創作上的「反共為主」，到文獻整理上的「詮釋爭奪」，到 2015 年抗戰勝利 70 年之際，又出現了新一輪的變化。

本場次最後由王梅香發表〈戰爭裡的青春：冷戰下的台灣女性勞動圖像〉，嘗試以美商公司中的勞動女性、家務勞動幫傭以及酒吧女三種職業為例，剖析冷戰下臺灣女性的勞動境況，重拾冷戰下被遺忘的歷史碎片。王梅香指出，在過去 30 年間冷戰與性別研究已建立起一種共生關係，譬

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以視訊方式發表論文



如美國如何透過家庭生活與現代化、消費主義的綑綁，凸顯出理想的美國女性形象；相對之下，美國媒體對蘇聯女性的再現，則通常是勤奮卻不具吸引力。這種對美國現代性的憧憬與肯定，同樣呈現在冷戰下臺灣的女性勞動階層中。

接續，王梅香認為冷戰下只有少數女性菁英能實現跨界移動，相對之下，基層的女性勞工則常出現被文學家再現的狀況。因此，透過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資料，王梅香分析出女性勞動者與冷戰結構的關係，譬如美商公司中的勞動女性對大型機械的現代性崇拜，以及對於美商專業分工的現代印象；美軍幫傭對於透過

人際網絡引介相當看重，以及不同地域家務勞動種類的差異。此外，「吧女」人數驟升，則與美軍的「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相關，在此計畫下，造成了酒吧女郎的離鄉與城鄉移動。透過三個工種的切面，王梅香除了呈現冷戰下的臺灣女性勞動者對美國現代性的肯定，女性的勞動與移動更是受到省籍、階級、人際網絡、所處地域與個人社會、文化資本的多重影響。

鄉關何處？當代臺灣社會與如何回望歷史

論壇一開始，林瓊華就對當今臺灣社會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質問：「臺



灣對於過往確實存在且影響臺灣民主與文化發展甚深的左翼歷史是否全盤理解？是否可能因如今的政治情勢而去脈絡化地選擇性隱匿甚至汙名？」林瓊華指出，2021 年臺灣文史學術界慶祝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卻少人提及 1927 年文協路線分歧時，連溫卿等中央委員的左翼主張是取得多數認同而改變文協政治路線的事實。在臺灣社會當前的政治條件和過往的白色恐怖歷史下，左翼史可說仍被紅白兩個中國在歷史與現實中持續進行思想綁架。即使少數如謝雪紅這樣獲得關注的女性，其面貌也受政治時局影響，其形象為各式言論所扭曲，導致對日治時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左翼歷史不甚理解的大眾，更難接受謝雪紅的存在。林瓊華因此提問：如果臺灣社會無法承認我們的歷史中確實存在過像謝雪紅這樣並重民主與階級平等的左翼女性，我們真正認識了左右完整的臺灣史嗎？事實上，謝雪紅政治色彩鮮明的生命歷程，從性別、階級與國族的交相辯證中，幫助 21 世紀的我們反思，關於歷史的認識、詮釋與建構，是否反映了今天的社會偏

見？而我們能否理性地從被威權統治集團挾持的意識形態偏見中真正解放，批判地繼承臺灣歷史留給後人豐富的思想遺產？

與此同時，關於女性的家鄉與歸屬，張俐璇也提及了一個從今日之眼回望過去國共關係的獨特文學作品——《雁城諜影》（上官鼎⁵，2015）。張俐璇指出，過往此類「抗戰小說」多是少年少女為主角的第一人稱敘事，且以成長小說的形式呈現，主旨多在反共而非抗戰，並受到特定獎項的高額獎金⁶資助發行。但《雁城諜影》的特殊之處不只在於其是二戰結束後超過 60 年的現代出版⁷的一部橫跨國共分裂、抗日戰爭乃至國共分治並且地域橫跨兩岸三地的小說，更在於其認真描寫抗戰，完全無意反共。其中，兩個女主角與男主角之間戀愛關係的政治隱喻尤為有趣，傾向國民黨政權的彭湘芷和傾向共產黨政權的羅百蕙，同時愛上譚唯駿，最後花落誰家，小說結尾並未言明，僅意味深長地以彭湘芷的女兒彭雁華穿著梅花裙，又獲得羅百蕙贈的譚唯

5 「上官鼎」曾是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玄於師大附中及臺灣大學就讀期間，與哥哥劉兆藜、弟弟劉兆凱三人共用的筆名。但自 2014 年《王道劍》出版以降的六本書皆由劉兆玄執筆，上官鼎這個筆名也就正式為劉兆玄單獨使用。

6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1950 年代由中國大陸出身作家張道藩、陳紀滢等人發起、成立，官方（國民黨）色彩濃厚。其長篇小說獎金高達 12,000 元臺幣，換算當時臺灣物價，香菸一包僅兩元，可知其獎金之高。

7 《雁城諜影》出版於 2015 年，適逢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也是馬關條約簽訂 120 周年。

駿的信作結，留予讀者各自詮解的空間。而作者安排兩人闊別多年最後於1997年香港回歸時在港碰面，亦顯示二戰後留予東亞最複雜難解的政治問題，如今依舊牽動著兩岸三地人民的生活。如何回望歷史？離散之人的家鄉又在何處？可見這些關乎廣大的歷史也關乎個人抉擇的問題，即使透過小說的形式，依然難以回答。

倘若真實女性的生命歷程是一面鏡子，則一部小說中的女性敘事與經驗，或許就是一則寓言，是對現實的隱喻與投射。在謝雪紅的生命經驗與虛構小說中的女性故事，共同映照出了當代臺灣社會對自身歷史認識的曖昧與局限，以及對建構臺灣主體性認同的茫然與焦慮。

冷戰、國共對峙下的臺灣與香港

1949年作為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國共分裂後受挫的人員往臺、港兩地移動，使香港社會出現大量遷徙、離散情境。及後五〇年代韓戰爆發，美援力量大舉滲入遠東地區，事實上，臺灣與香港在五〇年代以後乃共同鑲嵌在冷戰、現代化與國共內戰的重層框架之中。由是，臺、港兩地歷史共構與交涉現象亦不容忽視。在本場次中，林瓊華的發表充分展現出

香港曾經作為政治中立舞臺的歷史重要性。過往對五〇年代香港社會的討論，大多集中在1949年後從共產中國逃往香港的大量人員，如何改變並奠定了香港日後的人口組成。但林瓊華指出，謝雪紅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逃往香港並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可見香港左右兼容的特色。事實上，二二八事件以後，除了舊臺共分子逃亡香港，不少在二二八中受迫害的人士，亦選擇逃亡香港並重振旗鼓，以香港為基地實踐他們的政治理念。同樣，在張俐璇的文章中所選取的兩部抗戰小說——王藍《藍與黑》與上官鼎《雁城諜影》，其出版時間相差將近60年，但仍然不約而同地出現對「香港」的書寫與想像。在《藍與黑》的結局中，「香港」成為在反共基地中無法堅定信念、共渡時艱的人的逃逸之地；《雁城諜影》更直接將時空延伸到1997年，安排隱喻國共意識形態的主角彭湘芷與羅百蕙，在回歸之際的香港相遇。張俐璇更指出，代表共產黨政權的羅百蕙意氣風發，代表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彭湘芷則相對瘦弱，表面上看起來是以香港前途為題，隱喻當代國共間的角力關係。但彭湘芷雖表面衰弱，但比起無後的羅百蕙，彭卻有一個身穿梅花裙子的女兒彭雁華。在此一設定之下，國共間的角力關係在香港這個前殖民地更顯得曖昧與迷離。

撇開小說對「香港」作為隱喻符號的挪用，以及其意指何在，從謝雪紅的真實例子到《藍與黑》與《雁城喋影》中的「香港」形構，不難歸納出香港這一不中不英、不左不右（或「又中又英、又左又右」）的戰後特殊空間，在冷戰、國共關係、臺灣左翼思潮、戰後臺灣文學的跨域連結與關係性研究等多方面，皆具備相當大的研究空間，值得繼續鉅究。

發掘與還原——女性勞動者的離散軌跡

進入五〇年代，世界情勢不只從檯面上的熱戰轉變成檯面下的冷戰，全世界相當多人在這個歷史的節骨眼上，不由自主地歷經一場遷徙、離散之旅，離散因而成為全世界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而相較於戰爭洪流下的各種震撼事件與令人麻木的死亡，在歷史齒輪下顛沛流離的個人以及其心靈的不適應則難於呈現與關注。

據此，王鈺婷與王梅香的論文正

是透過離散女性的生命經驗，照見了人於流離失所中幽微的內心。兩篇文章不只同樣關心戰後臺灣女性，分別以知識分子（作家）與勞動階層為各自的關懷對象，說明了戰後的臺灣女性不只與外在社會結構產生連結，若然再加上省籍問題的考量，則新移民女作家同時亟需面對心理層面的問題，譬如如何重新適應新家園，整理過往家鄉記憶的遺緒等。

而王梅香指出，在國際情勢與國內情勢都極為緊張的狀態下，能夠在冷戰時期自由（跨國界）移動的女性實是少數，且多半是文化或是藝術菁英。於是大眾接觸到的多數離散經驗，大多都如王鈺婷和張俐璇前述提及與討論的那樣，來自於高知識分子階層的女性所寫就的散文或文學作品，而少有其他面貌。然而，在王梅香走訪田野的過程中，她發現五〇年代的臺灣社會，有一批女性勞動者（女工、保母和清潔人員、酒吧女）自有其獨特的移動軌跡與生命經驗。由於熱戰結束後，

冷戰時期的競爭逐漸從武器擴散到科技與工業設備，不少女性在戰後投入各式職場與工廠。又因為美國工廠的待遇比臺灣工廠的待遇更優越，許多女性為求更好的經濟條件，又或是嚮往美國現代性的生活，仰賴特定的人際網絡，由南而北（臺中美軍家庭移到陽明山美國軍區），由鄉村往城市（臺北、臺中和高雄市）移動。

相較於受戰爭所迫，流離失所而遷徙來臺的女性知識分子與作家，冷戰時期臺灣女性勞動者的移動看似更多是出於自願，也更具有能動性。而林瓊華所論及的謝雪紅，其移動與離散不只受迫於戰爭，同時也有出於政治理想而自願向北往俄羅斯求學的歷程。此外，比起知識女性透過文學作品記錄自身的離散經驗，勞動的女性則有賴於研究者的挖掘，透過口述歷史與田野訪談的方式將其生命經驗揭露。但無論是勞動者或者書寫者，即便是能夠為自己發聲的政治工作者如謝雪紅，經歷過時間的流逝，

也難免為人所遺忘，即使透過研究者不斷重新發掘為其招魂或還魂，社會與政治的變動也難使其面貌清晰地為人所知。

結語

無論是戰前或戰後，熱戰或冷戰，東亞社會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離散路徑與其獨特的生命經驗。無論是為了政治理想，又或是迫於戰爭求生，乃至追尋更好的勞動條件，離散始終是這些女性共同的生命歷程。也正是這些既相似又不相似的生命經驗，點滴匯聚構成了臺灣的歷史，以及今日的社會面貌。站在今時今日回望過去的臺灣，無論是政治領域、文學作品或社會各階層中的女性，徬徨有時，堅毅有時，痛苦有時，歡欣有時，她們認真生活的側顏是如此美麗，而她們美麗的面貌又是如此殊異，值得更多研究者悉心發掘，使其能重現於世人眼前，為我們反思歷史、觀照自身乃至展望前路，增添更多可能。